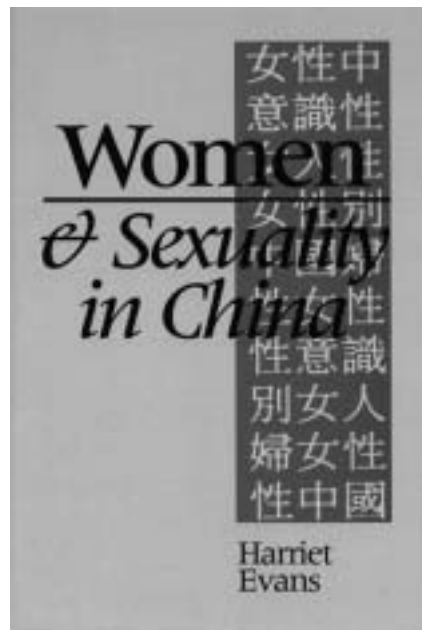


埃文斯的《中國婦女和性》

● 周煉紅

在當今的中國，性已成為大眾生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我想，生在中國的人和那些到中國訪問的華僑、西方人都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事實：如今中國的性文化的興起與熱烈確是今非昔比。



Harriet Evans,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Dominant Discourses of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New York: Continuum, 1996).

在當今的中國，性已成為大眾生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報攤小報的封面女郎性感而艷麗；霓虹燈

下廣告牌上的青春妙女有的含情脈脈地注視着你，有的則大膽而潑辣地盯着你。埃文斯 (Harriet Evans) 就從這裏開始分析、闡述中國女性和女性的性發展。她先描繪了一幅在中國隨手可得的、生動張揚的性畫面，繼而指出這是現代中國熱得不能再熱的性文化的點點滴滴。我想，生在中國的人和那些到中國訪問的華僑、西方人都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事實：如今中國的性文化的興起與熱烈確是今非昔比。

那麼，我們是如何進入現在瀰漫在大街小巷的「性泛濫」的時空中的呢？社會主義的中國清教徒式的說教，以及人們禁錮了幾十年的所謂褲帶之下的話題，是如何掙扎出腰帶緊紮而變成堂堂正正的話題的呢？一個曾經天天講意識形態的社會，一個在階級鬥爭這條軌道上執着地行走了很久的國度，是怎樣掙脫了沉重的枷鎖，而開始審視自己，把自己的利益看成高於他人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呢？里比多是怎樣衝出「自我」和「超我」的束縛而開

始沸騰起來的呢？是世紀的不安、急躁與困惑？是對過去的不滿和怨恨的爆發？是物極必反？還是春風吹又生的跳躍不安的里比多按捺不住，登上了中國社會舞台並開始唱起了主角？

人對自己的反思、對自己利益的關注與認識，免不了要從自己的感官世界開始，從自己的身體力行開始。歐洲文藝復興就體現了這樣一個歷程。在中世紀，「神」的觀念佔據了人們的思維，這是個神存在的世紀；而文藝復興，始自人們對自身的關懷。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人和「神」之間的永恆戰爭也有充分的表演。絕對理性的境界充滿了謊言，而這種境界終會幻滅。正如美國總統林肯所說：謊言可以欺騙一些人，但不能欺騙所有人。謊言可以猖狂一時，但不能猖狂永遠。

於是，在對「人」的思考變成人們的第一思考的時候，國人開始忙活於一代人以前被視為「可恥」的事情：享受生活、享受現在。而食和性是享受生活的一個標誌，是感官最好的滿足，同時也是最直接的自我表現方式。我們不得不在90年代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停下來思考和回顧這個驚人的變化，而埃文斯關於中國女性和女性性意識的過去和現在的作品出現得正是時候。

中國已經從性壓抑進入到性開放時代，女性是這場歷史變革中的主角嗎？性開放是婦女解放的表現和結果嗎？女性是性開放的代名詞嗎？性的意識和畫面總是以展示和透露女性的美和性感為基調，這是

女性性欲的自然外露，還是男性性欲的強烈要求？這些都是埃文斯關注的問題。這部1996年出版的作品現在讀起來之所以還有滋有味，就在於她從歷史和現實的觀點來探索這些問題並尋求答案。目前中國的性和性學的發展，簡言之：就性醫學而言是不講「廉恥」，在性娛樂方面是「一絲不掛」。然而，中國的性理論研究，尤其是女性的研究如對女性的性研究，可以說仍是未開墾的處女地。這也恰恰應了歌德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樹常青。

50年代到90年代 中國社會的性觀念

提起50年代，我們想起了純潔的少女，潔白無瑕。由於新中國的建立以及人們對共產黨的無限摯愛與熱情，使得50年代看起來似乎與性毫無關聯。難道50年代真是「非性」的年代嗎？埃文斯認為非也。50年代共產黨對性滿懷關注並建立了一系列關於性事的法規，《婚姻法》的產生就是一種對性的規定和限制。一夫一妻制第一次成為中國歷史上的合法婚姻制度。從封建帝制徹底解放出來的中國人大講特講自由戀愛，這種解放自由的精神是共產黨反傳統的延續。曾幾何時，流行於解放區的自由戀愛在50年代被法律形式規定起來。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戀愛觀」。「正確的」、「對的」等等都成為了人生道德倫理中心不可少的定語和形容詞。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道德語

目前中國的性和性學的發展，簡言之：就性醫學而言是不講「廉恥」，在性娛樂方面是「一絲不掛」。然而，中國的性理論研究，尤其是女性的研究如對女性的性研究，可以說仍是未開墾的處女地。這也恰恰應了歌德所說的，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樹常青。

個體存在的唯一理由在於他是建立共產主義的一分子，因此，人的性行為也必須受制於社會的倫理和法規。正是這種婚姻法規定了凡是陽萎和精神病患者都不能結婚，每一對「自由戀愛」的情侶都必須進行婚前檢查。可見，「自由戀愛」終究沒有戀愛的自由和婚姻的自由。

言成了每個公民的道德規範，個人的道德觀一定得與共產黨的道德觀相一致，而這種對錯絕對分明。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表達：黨等於科學，而科學總是對的，所以黨是對的；反過來說，反黨等於反科學，反科學等於不對的，所以反黨是不對的。這種邏輯與中世紀天主教教會證明上帝存在如出一轍，因為中世紀天主教教會的推理是：上帝是存在的，因為上帝的不存在是不可想像的。50年代的中國，人們重新生活在這樣的簡單邏輯錯誤之中：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因為不偉大光榮正確的共產黨是不可想像的。

在這種邏輯混亂的時代，「性觀念」也一定要與科學聯姻。因為一切如果不科學的話，那就是錯的，應該被揚棄。個體的私人生活也要科學化，應當屬於公眾生活的一部分。凡是從50年代和60年代過來的人都不會忘記「科學的戀愛觀」這個詞，它表明了一種現代的、理性的、科學的兩性關係。可是，「現代」、「理性」、「科學」這些詞並沒有得到進一步解釋，便成為不可懷疑的終極真理和不證自明的公理。「小芹」和「小二黑」的婚事就是這種新觀念和新法律的最好的、同時也是最得人心的宣傳戲。

埃文斯認為50年代的性觀念包含了兩個層面。首先，男女間的性是由生理功能、生理活動以及生理結構所組成的，也就是說，男女間的性首先具有生物學意義。1956年出版的《性的認識》以科學權威的口吻把性定義為異性間的本能，人類繁衍的必需。但是，更重要的是，

兩性間的性有着社會性的一面。個體在共產主義大廈的建設中喪失了主體性。換言之，個體存在的唯一理由在於他是建立共產主義的一分子，而分子總是不能大於總和的。因此，人的性行為也必須受制於社會的倫理和法規。

正是這種婚姻法規定了凡是陽萎和精神病患者都不能結婚，每一對「自由戀愛」的情侶都必須進行婚前檢查。只有婚前檢查合格者，政府才允許結婚。可見，「自由戀愛」終究沒有戀愛和婚姻的自由。人的生活中最個體化的行為已被國家機構牢牢地套死了。

婦女的貞潔觀在50年代也大受宣揚。「貞潔女」是全家的驕傲，而不貞則有辱家庭名聲。在《烈女傳》中，擁有外表美的女性被稱為「禍水」。無獨有偶，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穿高跟鞋和燙捲髮的女性會遭到社會輿論的冷眼和指責，被視為社會的「禍水」。

人們在這些空泛而具有相當威懾力的道德概念中過着一種緊張而原始的性生活。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性生活的唯一內容就是性交。90年代初中國人的性行為調查報告指出，在廣闊的農村裏，大多數人的性生活不過是兩分鐘內就完成的事，而且往往是穿着衣服，只解開小便時用的褲襠開口，完完全全成了短而急的男性發泄性行為。這種簡單快捷的性行為以男性為主導，由男性性欲的要求為開始，以男性性高潮的來臨為結束。有人調侃這樣的性行為體現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人們懷着本能的興奮和激動去性交，而

同時又受着道德倫理的「超我」的干預。於是，歷史上有了這樣一個奇怪現象：1960年初雖然是中國人自我禁錮的年代，但卻達到了歷史上的生育高峰。

從50年代到90年代，性觀念與當時的社會氛圍相適應，經歷了50年代的性純潔、60年代的性貧乏、70年代的性壓抑，進入到80年代的性蘇醒和90年代的性興奮。

80年代人們對性的討論標誌着中國人開始探討自我。然而，這種探討又表現出一種既怕又愛、欲言又止的心態。性成為中國人想拿，但又怕觸電的東西。

乍一看，80年代的性話題與50年代的相去甚遠，但細一琢磨，兩者之間其實有着極其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50年代的書籍《青年衛生手冊》和80年代的文章〈我如何制止了手淫的壞習慣〉，都對自慰嗤之以鼻。80年代人們生活在色彩斑斕之中，自以為與50年代的人不能同日而語。殊不知，兩個時代的人仍舊在對性的認識上如履薄冰，步履緩慢。埃文斯就以對自慰的態度為例子，在我們面前淋漓盡緻地揭示了50年代至80代表象上的進步和實質上的停滯。

女性的呼聲與歷史的回音

時代的進步是由女性地位的變遷帶來的嗎？婦女地位的變遷是不同時代的結果嗎？埃文斯的書在對時代的分析和回顧中一步一步記錄着婦女的進步。她的痛苦、呻吟、解放、自由、微笑和掙扎鋪成了

一條漫長的歷史之路。在這條路上，有的女性被遺忘、被出賣、被吞噬了，有的則仍然堅定地走下去。

可以肯定的是，《婚姻法》在理論上解放了婦女。但這種解放了的婦女仍生活在物質相對貧乏、社會體制全新但仍以男性為主宰的社會。所以，婦女的婚姻自由事實上仍是受時代制約而難以徹底實現的夢想。婚姻自由在保護婦女權益的同時也制約了婦女的性行為。一夫一妻制要求女性單方面支持和扶助男性的性生活和興趣：一方面，她要成為他的倫理道德上的指路人，防止他的婚外性行為；另一方面，她也要塑造一種新的道德形象來自我束縛。比如說，女性不能把這種自由婚姻理解為結婚與否完全是自己的決定。如果女性真的以不結婚為自己的生活方式，那麼她的左鄰右舍、親朋好友，乃至工作中的上級、同事都蜂湧而至百般游說，以示關心。因為不結婚的女人是正常的。這種不正常包含了雙層意思：或者生理有缺陷，或者精神變態。

從封建社會的桎梏下解救出來的中國女性，又進入一種情感的沙漠之中。在這種解放的進步中，女性的性欲和性行為被妖魔化和單一化。女性不是自己性欲和性生活的主宰，而是法律、國家的附屬物，蜚短流長的對象。強加在婦女身上的繁多定義和條規傷害了她的心理和生理。封建社會通行男女授受不親，而新時代的婦女要有新的無知和愚昧。文革時期曾經流傳着這樣一個笑話：一對夫妻久不生育，於

90年代初中國人的性行為調查報告中指出，農村中大多數人的性生活不過是兩分鐘內就完成的事，而且往往是穿着衣服，只解開小便時用的褲襠開口，完完全全成了短而急的男性發泄性行為。有人調侃這樣的性行為體現了「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

文革時期曾經流傳着這樣一個笑話：一對夫妻久不生育，經婦科檢查，終於發現女方仍是處女。原來結婚經年，這對夫妻一直進行着尿道性交。這一笑話有多層含義，一則給人們多少傳達了一點生理知識，二則反映了生育成為性交的終極目的。

是去看醫生。經婦科檢查，終於發現女方仍是處女。原來結婚經年，這對夫妻一直進行着尿道性交。這一笑話有多層含義，一則給人們多少傳達了一點生理知識，二則反映了生育成為性交的終極目的。

埃文斯以生動的筆觸和清晰的思維把屬於我們的歷史勾勒在我們眼前，而我們則用自己的生活和故事去把這種歷史具體化，使之更豐滿、生動。然而，在這一具體化或者故事化的過程中，一種沉甸甸的辛酸之情也不由泛出心頭，使人感慨萬端。但更重要的是，這種個人的感歎應當成為關注中國女性過去和未來的鼓勵和動力。女性在新中國能支撐半邊天的時候，她身上卻同時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那就是女性的自我與性的失落。

文革時期的樣板戲是共產黨對中國人民的一次大洗腦。一切與性相關聯的東西都變成了骯髒的、可恥的，從而被指斥和漠視。哪怕是批判封建社會壓迫女性的《白毛女》，也改頭換面成為階級壓迫的宣傳戲。黃世仁對喜兒的性迫害被淡化和隱去，而並非實質的主僕矛盾則被強化和突出。在所有的樣板戲裏，居然看不到一對夫妻出現。阿慶嫂已婚有夫，但阿慶卻沒有戲。李玉和威風凜凜，卻也不見他的女人。根據《林海雪原》改編的《智取威虎山》不見了那個對二〇三首長鍾情而又長得嫵媚的小白鴿——白茹。《龍江頌》裏的江水英是否是女人已令人生疑。總之，革命讓性遠遠離開，革命拒斥性的存在。正如阿Q頭禿，從而忌諱他人言及燈、亮等

詞彙一樣，革命的人們也對性充滿了刻意的冷漠和敵視。

埃文斯認為，在遠離城市喧囂的山野裏，紅衛兵小將的性生活則是另外一番風景。「手抄本」成了處於青年期的紅衛兵的性啟蒙作品，而相對枯燥、單調的鄉村生活則為紅衛兵小將提供了性回憶、性嚮往的空間，相對鬆弛的政治環境又讓紅衛兵小將有了實現性夢想的機會。

文化大革命的喧鬧的基礎是沉默和否認。婦女外表的非女性化以及語言的變遷都是在不言不語中進行。整個社會在婦女問題上、婚姻問題上都沉默不語。男女平等代替了男女差別。齊耳短髮和灰色衣褲把女性的風姿銷蝕得無影無蹤。多少包含一些政治色彩的「愛人」代替了丈夫與妻子的稱謂。誰是女、誰是男，變得很有些混沌不清。當「敬愛的」江青同志終於讓我意識到她是個女性時，我着實驚詫不已，因為在電影、報紙中她與男性並無分別。

80年代的五彩世界以市場經濟為開導和基調。在這種氛圍下，性不便再被短髮和長褲所掩飾，而成為市場經濟中不可拒絕的興奮劑和暢銷的商品。笑貧不笑娼不再只是一種說法而已，更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標誌，女性於是成了商品經濟中打上產品印記的角色。妓女走上了街頭巷尾，買賣婚姻流行於窮鄉僻壤。與50年代的性管制相比，80年代後的性顯現出急不可耐的興奮和狂熱。

文學作品中，挖掘性本能、性愉悅成為時尚。地方小報起勁鼓勵



埃文斯顯然低估了50年代《婚姻法》誕生的意義。其實，在此以前的中國歷史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幾乎佔據了統治地位，而且，指腹為婚以及三房四妾都極為流行。所以，50年代《婚姻法》從法律的權威高度把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固定下來，是一件婦女解放的劃時代大事。

女性尋找屬於自己的快樂和宣泄。性調查報告成為非文藝作品中的暢銷品。女性漸漸地在這種以男性為性生活軸心的社會中關注自我，體會性意識和性行為。雖然女性對性快樂的追求還只是羞羞答答的，而且也只有少數人敢於為此，但畢竟加了一批具有勇氣和敢於搖旗吶喊的隊伍。

當然，這時候有關性的態度和理論仍不能超越以生物為基礎的理論，仍不能構成一定的飛躍，從而指導女性。

對埃文斯的批評之批評

埃文斯在書中分析了大量非文藝作品的文章，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她闡述了1949年後短暫而崎嶇的歷程，把中國人的問題與困

惑及其產生的根源介紹給世界，並用西方性學的理論來分析這些現象。由於她採用了許多原始材料，從而使得她的闡述與論證顯得並非空穴來風。當然，她的分析與判斷並非無可指摘。一般而言，西方人在看待中國的事情時，往往缺少把客體放在中國五千年漫長歷史中去審視的眼光，也缺少對中國整個複雜、巨大、紛繁的風俗和價值體系的基本了解，而且往往有意無意地露出西方中心論的偏見，以西方的價值觀作為參照系去考量中國的現象。埃文斯似乎也難脫這種窠臼。下面就從西方人常犯的三種通病考察埃文斯的批評。

埃文斯所考察的中國人的性和中國女性，其實只是截取了1949年到1990年代這一期間，然而，這只是中國悠久歷史中的一瞬。許多現象如果孤立地看，似乎並不是一種

埃文斯在分析時儘管顯得中肯客觀，並難能可貴地研究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但她在應用這些資料去看待事情時，其實是先把西方性學的觀點以及西方性的價值體系放在參照系的高度，然後去衡量中國人的性。

飛躍，然而倘若把這些現象放到整個中國歷史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則許多新現象都具有空前的意義。比如，埃文斯顯然低估了50年代《婚姻法》誕生的意義。其實，在此以前的中國歷史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幾乎佔據了統治地位，正因為如此，卓文君、司馬相如私奔的故事才在中國廣為流傳，備受欣賞。而且，指腹為婚以及三房四妾都極為流行。所以，50年代《婚姻法》從法律的權威高度把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固定下來，是一件婦女解放的劃時代大事。又比如，貞操觀的建立，共產黨並非始作俑者。追溯歷史，其實貞操觀一直牢固地盤踞在中國人的大腦及世俗生活之中。宋明理學甚至把貞操觀發展到精微的高度，由此也使那一時期成為中國婦女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其次，埃文斯在分析中國人的性及女性時顯得對中國整體價值、風俗、文化體系缺乏了解，比如她對60年代中國人自我禁錮與生育高峰相伴生的現象感到迷惑就是很好的說明。中國人自古就有多子多福、養兒防老、四代同堂、傳宗接代這些頑固的價值觀念，自我禁錮並不能鏟除這種觀念。不要說共產黨那時還推崇人多力量大，鼓勵人民生育。即使是歷史上的災荒年間、戰爭年代，中國的人口繁殖速率也一直未曾減慢。這其實是農業文明的一種特徵，而不是共產黨製造出來的奇迹。況且，生育與性的頻度，性壓抑還是性歡悅也不具備一種等比關係。兩性交媾中其實只有極小部分與生育相關，而大部分時間性只意味着性欲的實現和滿

足；孕育生命可以在歡樂中進行的，也可以是在痛苦中進行的。不然的話，我們反而不能理解性開放的西方何以不能刺激人口的急劇增長，反見人口增長放慢。

第三，埃文斯在分析時儘管顯得中肯客觀，並難能可貴地研究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但她在應用這些資料去看待事情時，其實是先把西方性學的觀點以及西方性的價值體系放在參照系的高度，然後去衡量中國人的性。比如中國的《婚姻法》裏否定了精神病患者以及近親可以結婚，這在埃文斯看來是自由戀愛、婚姻自主不徹底的體現。當然，在美國，同性戀也可以登記成婚，至於誰想跟誰同居也純是個人的事。但是，反過來，在中國施行人工流產極為容易，而美國迄今還在為人工流產的合法化爭論不休，刀槍相見。異文化之間其實很難爭出孰優孰劣，最為可行可取的態度就是尊重彼此的差異。

當然，以一個西方學者的眼睛來打量中國人的性及中國女人，肯定不乏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效果。埃文斯對中國女性在歷史禁錮中作出的掙扎所給予的那種同情，不覺流露於字裏行間。她把中國婦女放在世界婦女這個大群體中來考察，作出了許多鞭辟入裏的分析和判斷，相信對中國的女性學將會是一份不小的貢獻。

周煉紅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圖書館學碩士，現任美國金賽性研究所圖書館館長